

伟人毛泽东丛书

文化巨人毛泽东

Wei Ren Mao Ze Dong—Wen Hua Ju Ren Mao Ze Dong

邓力群/主编

(二)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ZHONG YANG MIN ZU DA XUE CHU BAN SHE

伟人毛泽东

文化巨人毛泽东

(二)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总 目

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	戴知贤(1)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	陈 晋(195)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陈 晋(475)
毛泽东文艺思想新探	周申明(751)
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	张 健(1019)
毛泽东的教育实践	张 健(1249)
试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唐秉仁(1455)
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	卢文峰(1465)
毛泽东的科学观	田 夫(1481)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吴义生 刘宏毅(1597)
毛泽东与科学家	孔令华 蒋国华(1733)
毛泽东读史	张贻玖(1889)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	王子今(2015)
诗家毛泽东	龚国基(2215)
行草书圣毛泽东	王鹤滨(2655)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	刘锡山(2767)
翰墨春秋	张铁民(2921)

目 录

引 论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479)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接受到结合	(479)
二、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关系	(485)
三、文化探索的六个阶段	(489)
四、评价和运用传统文化的三个基点	(495)
五、文艺观与文艺史观	(498)
六、同传统文艺“对话”中的内心世界	(505)
第一章 风华文章	
——青年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510)
一、文学与启蒙	(510)
二、切实尚用——文艺价值观	(516)
三、主体气势——文艺创作观	(525)
四、诗文寻踪——文艺继承观	(535)
五、主义与大众——文艺发展观	(545)
第二章 历史沉思	
——毛泽东与古典小说	(553)
一、“修辞艺术”与“史贵于文”	(553)
二、反映论与小说批评	(563)
三、《红楼梦》风波	(575)
四、《水浒传》与革命	(584)
第三章 浪漫情怀	
——毛泽东与神话传说	(599)
一、神话与现实	(599)

二、“搬山”与“打鬼”	(608)
三、神权与人力	(617)
四、理想与想象	(622)
五、游仙与华章	(631)
第四章 文化改造	
——毛泽东与传统戏曲	(641)
一、帝王将相与历史颠倒	(641)
二、“牛鬼蛇神”与百花齐放	(651)
三、推陈出新与戏曲改革	(661)
四、欣赏情趣与流派风格	(672)
第五章 诗家识见	
——毛泽东与诗词文赋（上）	(676)
一、语言故乡	(676)
二、知人·论文·索志	(679)
三、诗·史·思	(687)
四、格律与比兴	(697)
五、古典加民歌	(703)
第六章 英雄风骚	
——毛泽东与诗词文赋（下）	(709)
一、数风流人物	(709)
二、铸巨人时空	(721)
三、扬冲决气概	(727)
四、不废婉约	(737)
五、暮年忧患	(742)
后 记	(748)

引 论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文化”概念的内含，向来争论不休，界说数不胜数。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著述，涉及“文化”之处颇多，但也没有对它下过确切定义。他主要是从精神文化角度来使用这一概念，尤以《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用法最多，在谈到中西方文化的时候，毛泽东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偶尔也包括物质技术，其义大体近于“文明”一词。做这个辨析，是为了让读者对本书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有一了解。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接受到结合

从文化形态上讲，毛泽东及其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最根本的贡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把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彻底的叛逆性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大概是不会有疑问的。

作为政治或哲学意义上的概括，“中国化”或“结合”渍然已经清楚表达了这两种文化来源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组合关系。但如果进一步从文化学角度来分析，泛泛谈“结合”则未免抽象了一些，在如何深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塑造毛泽东的思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时，就不那么明晰了，意见也不尽一致。这确实是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非要争个“孰轻孰重”或索性来个“二元并立”，或进一步把“结合”局限于例证毛泽东怎样广泛引用古代经典，如何运用民族语言和表述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论，局限于分析毛泽

东改造了几对传统哲学范畴，似乎也难说是深刻把握了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内在关联。

关键恐怕在怎样理解这个“结合”，特别是毛泽东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中的艰苦的探索过程和独特的结合方式。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首先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说，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24岁才知道马克思。建党时，我们也很幼稚，开始搞革命，谁知道怎么搞呀？毛泽东关于其思想形成过程的自述，透露出他在文化吸收上的阶段性及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后期，毛泽东上承朱熹之论，下受杨昌济影响，孜孜于“本源”的寻求。所谓“本源”，类似于客观唯心主义的“道”（老、庄）、“太极”之“理”（朱熹）、“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被毛泽东视为“宇宙之真理”。^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寻求“本源”演变为寻求“主义”，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极为迫切的思维中心和压倒一切的研究目标。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断地选择，也不断地放弃。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他都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但似乎都没有使他成为其中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在种种如饥似渴的选择和尝试都失败或无效的情况下，他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②

近代以来，先进分子在文化理论上寻求主义，同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中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毛泽东确立其终生信念，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独特的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半个世纪以来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国传统（如“东方文化派”的主张）和近代西方模式（如“全盘西化派”的主张）两种文化走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及精神支点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

^①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② 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

的生产关系，但又反抗这一社会制度，并且理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反对封建传统。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洗礼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主观意识里大多存有这样一个动因：既批判和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拒绝和超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前者，自不难理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反对封建传统。关于后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 反帝爱国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思想起点，这种民族感情使他们在看待中西方文化时显得更审慎一些，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也注意到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易走向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泥坑。毛泽东在批判传统“太旧”“太坏”的同时，便及时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①并认为东方文明即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应占“半壁的地位”。^②在社会理想上，受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影响，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也难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实现文化符号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如十月革命后，有人曾把“社会主义”译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刘少奇说他1921年到莫斯科，看到卢布票子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中文翻译，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颇说明问题。^③2) 从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大气候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派萧条危机和阶级对立悬殊的境况，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改造道路时，很难对这种社会及其文化形态表示好感。周恩来到日本、到西欧的所见所闻，便是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毛泽东虽未出洋，但背景是一样的，潜在的思想逻辑是一样的。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当时寻求的“主义”，是期望它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彻底性，把握宇宙之真理，更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在1920年12月给蔡和森等人的那封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中，他说他不同意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德漠克拉西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此相反，列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俄国取得成功，恰恰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优势。此外，毛泽东当时突出的反强权平民主义立场，强调“动”“斗”的鲜明个性，以及对新村主义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

①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

② 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

③ 刘少奇：《1948年7月1日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3期。

性质的思潮的特殊兴趣，无疑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级阶梯，构成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如解放无产阶级的使命、阶级斗争观念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的心理契机。于是，一开始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四海胞主义，也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提出俄国式暴力革命的理由，在于资本家有一种自己不能遏制的扩张欲望，只有造出一种相反的扩张力量来抵抗、来斗争，才能达社会平等之目的。”^①

对于革命家来说，接受和确立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只是其崭新实践的开端，而非其实践的理论总结或逻辑终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接下来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把它从孕育自己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提取出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把它恰当地有效地运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则须更艰苦更具独创性的实践探索，可以说这种探索并不比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探索容易。

在毛泽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始终伴随着文化选择上的分歧和冲突，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

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

1. 同全盘西化论的分歧和冲突。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出的“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② 和后来提出的“洋为中用”的主张，可概括他一生在吸收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基本思路，体现同全盘西化主张的分歧所在。

2. 同东方文化救世思潮的分歧和冲突。梁漱溟先生是此种思潮的重要代表。就他个人的思路而言，正如他说的那样：“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③ 所谓“外国的办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梁先生认为，中国几十年来之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问题，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社会改造的前途是，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即可。^④ 对这种承袭近代以来“中体西用”主张的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文化选择，毛泽东也是明确反对的。“五四”时期

① 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复信。

② 1915年9月6日致肖子升信。

③ 梁漱溟，《我的反省与努力》第138页，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集中批评了“中体西用”主张，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思想。还不无调侃地说“中体西用”论者吸收西方文化的目的，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可能使旧中国文化思想产生透底的变革。1938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梁漱溟就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性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改造中国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当面展开了论争，他的具体的批评意见，表现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所作的批语当中。^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不同意梁先生说的中西方文化的造诣“都很高”，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文化改良，而“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

3. 同托派思想的分歧和冲突。这虽然表现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前景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但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却是怎样看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地位，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30年代初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一批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同以《动力》杂志为基地的托陈派文人所进行的那场著名论战的基本主题。托陈派的基本观点是：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使近代以来的封建传统残余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的社会，由此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在中国已经完成，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类“土匪行动”、“破坏行动”，转而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与此相反，参加论战的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则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地上，而农村仍然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为主体，因此，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明确无疑的。“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② 这

^① 详细论述请参见拙文《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论争》，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② 王昂（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引自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个结论，是这场兼具文化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论战的一大收获，也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当年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同苏区的革命实践更有直接关联。毛泽东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战，但在1929年11月给李立三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托陈派的观点和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宣传。”^① 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系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30年代初，为了彻底弄清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俗、教育诸方面的性质特征，解决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丰富详实的实例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虽然不是直接回答托派观点的，但却是对他们的观点很有份量的批驳。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发展角度讲，这些调查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构成他反对另一种错误的文化理论选择偏向的重要基础。这就是——

4. 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以上三种思潮，尽管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或“西化”、或“守旧”、或“取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理论上抵制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从而在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焦点则在于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和发展角度讲，这一分歧和斗争是最具关键意义的，并充分体现了文化选择上的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同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

从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机械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围绕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论，实质性的理论主题，就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其具体结论，同中国国情及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当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任务，强调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的时候，王明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无所指的要人们注意几个“不能”，即对马列理论“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旧中国化学说来曲解”，“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② 作为一般的论述，指出这些当然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

是有益的，问题是这些并非当时的偏向，其实际的针对性和潜台词，若明白王明等的一贯主张，一看便知。而毛泽东的观点是：对于“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小学生”。^①此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一场批判党内“全盘西化论”（毛泽东称之为“洋八股”），端正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识的思想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教条主义同西化论者在思想方法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毛病“传染给了共产党”，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②由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和鼓励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思想史。又说：“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③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才从全党的认识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需要“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毛泽东的思想，也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和完备起来的。

二、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关系

由上所述，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无论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都必然地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主要方面而言，特别是从建国前的实际效果而言，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既是通过实践探索来解决的，也是通过同上述各种文化思潮的分歧和斗争，力图在理论上澄清与它们的区别来解决的。因此，“中国化”的含义应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也是最根本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第二层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于是，在谈到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关系的时候，笔者认为下面两种说法不能认为是周全的。一种是：毛泽东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仅是一种被他简化了的东西或把它当作了外在的工具，从而掩盖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深而持久的信仰。一种是：毛泽东只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756、755页。

③ 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上的报告。

思想土壤，进而离开中国的传统仅仅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结论、思想方法的公开宣传和阐述来解释他的思想行为特征。

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和他所受的影响程度？国外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著述中语言素材的统计，由此判断毛慷慨地拥有大量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据说，“毛引用得最多的是孔夫子和新孔夫子的原话，其次是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引用得最少。”^①这个事实确实表明毛泽东的知识背景、认知方式和思想表达及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或者说他最熟悉的是中国文化。这样的考察思路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以此来说明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的思想形成根源的强弱，则多少有些牵强，是以机械的语言素材的统计数字来冲淡对其活生生的思想灵魂的深层分析和把握。以此类推，还会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所以他比西方人更多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施与他的影响；马克思是德国人，所以他更多的受到德国文化的熏染；列宁是俄国人，所以他注定受到俄罗斯传统的铸造。不错，但学术份量有多大呢？此外，毛泽东读列宁、斯大林著作确实要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多些，这不难理解。毛泽东一向宣称，他更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而不拘泥于本本词句；列宁、斯大林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对中国来说，更具实践上的示范意义。对此，“引用”的数字同样不能说明毛泽东与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关系上有什么可疑惑的蹊跷之处。（至于斯大林著述中的某些错误对毛的影响，是这个问题以外的话题。）

我们应着重考虑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特征和他对基本理论的阐述中所表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两种文化的“结合”，在毛的论述和实践中，不是杂揉相加，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机械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简单修正延续。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拿来”。表现为：通过民族形式来理解、实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或反过来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说明和发挥民族传统的一些重要内容；在两种文化的交合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它既非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也非中国传统的机械复归。

^① 尼克·赖特：《西方毛泽东研究：分析及评价》，《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年第4期。

我们甚至还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并矢志尊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描绘的理想蓝图。这种胶着状态既表明两种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融汇得十分深透，也说明他在“结合”上下功夫，事实上也存在着如何协调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自觉吸收与潜意识表露的问题。

由此，研究毛泽东同两种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的各种思想学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思维方式等如何具体地沉淀在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如何从他的理论与实践透露出；这样，方能真切体会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化气质、文化根基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须承认，毛泽东的思想的根本性质，并非“引儒入马”或在马克思作义之外重构了一个崭新的体系，而是把它转化成了另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即中国人寻求解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一种发展形态和一种独特的民族形态。其基本的概念、范畴、方法、结论和内在逻辑，都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规定。只不过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不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生搬硬套，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像没有抽象的人，而只有作为张三、李四这样一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样。

如何解决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组矛盾，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谁在理论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据此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谁的思想就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旗帜。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探索的结果，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实践成果是：使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独创出一条基本成功的路子，于5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可以分割的。无论是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

变，都是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第一，两个转变的根本动力和催化剂，是实践和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的探索，用他的话来说，都是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他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从传统、从马列经典出发寻求印证或演绎。唯其如此，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都是不拘一格地拿来；唯其如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传统文化现象和思想，通过对其内涵的改造，引伸出有利于实践的新义。这种新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民族的，对传统来说，是现代的。譬如，1939年2月20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他谈到孔子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时，便说：“智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这是朱熹注《孟子》的话，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引者），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同年4月29日在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的讲话中，他提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虽然是在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氛围中形成的，但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相通的东西，体现出某些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认识规律、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是毫无“共同语言”，乃至水火不容，就谈不上“结合”或相互之间的“化”。两种文化形态在揭示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的联系，构成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的逻辑前提。诸如：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宗

教神学世界观的主张，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排拒神道而重现世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他人、注重群体的道德观念；“平均”、“大同”与共产主义；“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导致阶级反抗；“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与群众路线；阴阳二元论与矛盾辩证法；“民以食为天”与历史唯物主义；“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经济基础决定道德习俗……等等，都是两种文化结合的内在契机。考虑到并深入研究这些联系，便不致于把“结合”或“中国化”看得那样难解莫测。

三、文化探索的六个阶段

正是立足于实践，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使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考察这个阶段性，是避免在这个课题上犯以偏概全的简单化的毛病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运用和评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吸收与选择——“五四”前后。

实践中运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考虑农民革命及其道路问题。理论上着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特征，特别是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以及农民的处境命运。实践上，他用全副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在促进农民运动冲决中国封建传统四大“绳索”，赞美“分田分地真忙”景象的同时，冷静地认识到，农民们只能挟带着深厚的小农生产者的文化心理和习俗愿望来从事解放自身的事业，体会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复杂性。毛泽东的选择是：只有在政治，经济上翻身，才能获得文化心理和精神上的真正变革和进步，别人不应过早地越俎代庖替农民“丢菩萨”。^①这种务实的态度，使毛泽东较注重利用传统来推进崭新的革命。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我们当然不必渲染这一观点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与文化传统的思

^① 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想中的位置，而且此后毛泽东也极少对这一说法做过暗示和发挥。但它至少反映出毛泽东这样一种潜在的思路：中国的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后来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也大体是基于这种考虑。^①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当毛泽东做出秋收起义、进军罗霄山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改进红军作风等一系列卓越选择时，他脑海里也时常闪现出历史上的“绿林好汉”、“山大王”的行为方式，特别是经常用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战士。^②他在苏区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被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路线”；他的一些主张被说成是缺少马列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论”；在军事指挥上，被嘲讽为“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③这些指责和嘲讽除了说明教条主义的无知和愚笨以外，恰恰衬托出毛泽东在利用传统问题上的正确和精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揭示了这样一条思路：教条主义同中国传统的某些消极心理恰恰有着某种关联，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④这个见解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上也颇有启发意义。

的确，中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的心态乃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以无数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态自然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因此，毛泽东在运用传统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对它的某些消极影响的批评和改造，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述，便集中体现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当中。后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几乎是用传统的儒家心性修养的方式，来要求人们放弃传统的小农身上的自私自利的倾向，希望参加革命的人要把牺牲精神落到实处：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

①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要把最高原则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结合起来。象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社会主义，扩大城市都不要忘记。可是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才算联系群众。接着以彭湃的活动为例说，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2月19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

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③ 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第34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 1941年9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